**八十年代青年主体之重构**

**——从“潘晓讨论”到《你别无选择》**

 **摘　　要**

在八十年代思想史上，“潘晓讨论”曾引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开启了一代中国青年思想解放的闸门。本文第一部分以发表于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作为切入点，分析指出“潘晓讨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实际涉及的是青年主体重构问题。作为重建“青年主体”的“元问题”，“潘晓问题”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并由此探索出不同的主体重构之路；第二部分通过三个典型文本《新星》、《人生》、《你别无选择》来解读八十年代青年主体重构的不同价值面向：一方面是强烈的理想主义冲动，另一方面是虚无情绪的蔓延，使得重建青年主体困难重重；第三部分通过总结以上三个文本对于“潘晓问题”的回应，说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并强调其价值。

**关键词：**潘晓讨论　　　青年主体重构　　　理想主义　　　虚无主义

**Abstract**

The far reaching discussion about what is “meaning of life”, also known as “Pan Xiao’s problem” in the 1980s, initiated by Chinese Youth, is of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a letter appeared on China Youth titled *So far, So narrow, the Way of Life* on 5, 1980, with the pseudo-name Pan Xiao. To some extent, this discussion reflected the problem of youth’s subjectivity. Taking the dilemma of Pan Xiao as a motif, this paper traces different solutions in novels in the 1980s. By analyzing different images of youth in the three novels, *Nova*, *Life*, and *You Have No Choice*,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solve “Pan Xiao’s dilemma”, idealism and nihilism, which make the problem more complicated. Finall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possibility by summarizing all above.

**Key Words:**Pan Xiao’s dilemma　　　The Reconstruction of Youth’s Subjectivity　　　Idealism　　　Nihilism

目　　录

**一、 青年主体问题的提出和讨论1**

**二、 青年主体重构的不同价值面向2**

**三、 结语：历史的可能性7**

**参考文献9**

1. **青年主体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全国上下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是以《中国青年》杂志为阵地的。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关注青年思想问题、引导青年规范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思想讨论，包括“应该根据什么来建构我们的远大理想？”、“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等与当时重大思潮相呼应的问题。当时，《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通过调研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1]](#footnote-1)“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她们发现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便向她约稿。黄晓菊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7000多字，4个小标题分别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文章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和自己当前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在此基础上，《中国青年》编辑部吸收了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来稿中的部分观点，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整理、修改和个别地方的补充，征得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作为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发端。”[[2]](#footnote-2)由以上材料，“潘晓讨论”这一事件的生产是有计划性的，无论是“编者按”还是为此次事件作结的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其核心都在呼吁青年投身他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进程中，意在引导青年找到正确的社会位置。这实际上提出的是青年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潘晓来信”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答：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潘晓”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3]](#footnote-3)“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一经典论断于此提出，它的意义在于重新审视个体和他者关系的复杂性，并把个体置身于社会这个大“他者”中。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日常生活遭遇的挫折使“潘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学写作上，而其目的则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因为“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4]](#footnote-4)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七年文学”至“文革文学”，文学作品中青年的自我时刻都与时代相连，被卷入历史的“宏大叙述”中，而“潘晓来信”则提供了一种力图将个体从集体规范中解放出来的动力机制，自我个性在这里重新被发现和召唤。通过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青年形象被建构起来，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一文中指出，将潘晓的经历放置到历史语境中，可以得出对“潘晓”形象的准确表述：“一个在十年文革中遭到许多挫折并因此而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文学青年。实际上，我们在潘晓的经历中可以读出另外一个隐藏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表述：在‘我’十岁那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从此‘我’的生活进入了黑暗时期——所以，‘我’对生活、人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也就是说，正是出于对‘文革’的否定，《中国青年》才塑造了‘潘晓’这样一个‘受害者’的青年形象。”[[5]](#footnote-5)除此之外，生活的种种不幸使“潘晓”成为一个“分裂”的人，她“一方面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又随波逐流”，因而文本同时叙述出一个与外界疏离、内在分裂的个人形象。“如果说‘潘晓讨论’是一个双重文本的话，它的表层文本是一个青年的困惑迷惘问题，而其深层文本却是一代青年人在历史的变局面前，如何反思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重新认识自我和他者、自我和历史、重建历史主体的精神重构问题。”[[6]](#footnote-6)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万千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7个多月的时间，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一半以上的来稿不但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还讲述了自己类似潘晓和比潘晓更为艰难坎坷的人生经历。”[[7]](#footnote-7)每个人都力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无论对潘晓的观点是认同还是反对，青年们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个体在社会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这就使“潘晓”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被建构为一个“所有青年”的问题。

作为重建“青年主体”的“元问题”，“潘晓问题”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并由此探索出不同的主体重构之路。以下，本文将通过三个典型文本《新星》、《人生》、《你别无选择》来解读八十年代青年主体重构的不同价值面向。

1. **青年主体重构的不同价值面向**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从精神史的角度分析指出，“历史的挫折引发的对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的怀疑所导致的信仰危机，使得‘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相当部分人群，特别是精神、人格形成关键期处于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新人打造笼罩性氛围的当时少年、现在青年的一代中，一方面弥漫着因狂热而虚脱，因热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虚无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另一方面，与这种虚脱、冷漠、虚无相对，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虽然其先前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亦受到此历史挫折的强烈打击，但却没有影响到他们认为人应该对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和认为人应该追求有明确意义感的生存方式这两种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因而，我们于潘晓的例子中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8]](#footnote-8)

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全力打造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新星》中的李向南无疑是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有理想有激情，力求用自己的创造性实践去影响社会，为一个尽可能理想的社会奋斗；他有政治智慧，善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以思想和行动的魅力去征服异议者；他机智果断、雷厉风行，在改革中遭遇重重阻挠却始终没有对生活和事业失去信心。李向南强大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身份”上的优越感。文本中对李向南的个人经历叙述如下，“六五年进校读高一”[[9]](#footnote-9)，“北京学生，在农村当过几年生产队长，后来被调到省调研室。七七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省委，这次被任命为县委书记。”[[10]](#footnote-10)由此可知，李向南属于老三届毕业生，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参与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时，他的父亲是前工业部部长，他的上司省委书记顾恒和他父亲是老朋友，县委副书记顾荣曾是他父亲的老部下。以上种种，为他成为改革的领导者提供了合理性。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给了他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的条件。

对于李向南来说，他的人生价值就在于领导和拯救他人。一方面，他以威权政治改革为手段来改变古陵县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包括处理上访问题、召开“提意见提建议大会”、处理电业局公款宴请问题、亲自带领县常委委员下乡考察等，在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在群众一声声“李青天”的称赞中，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他以一种近乎英雄的形象进入古陵县改革的历史时空中，并为自己找到了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改造他者（林虹）的思想来获得尊重和认同。李向南和林虹在陈村初次见面，当林虹谈到自我选择和自由时，他便以一种说教式的口吻来“教导”林虹：

“是你的人生哲学？”

“我的哲学大概还要加一句：自我完善。”

“有点像宗教。”

“谁没宗教？英雄要永垂青史，文学家要流芳百世，哪个不是宗教？你不是要完善社会吗？你完善你的社会，我完善我的自己。”

“离开了完善社会，完善不了自己。”

“那可不一定。可能你完善不了社会，我却能完善自己。”她见李向南还要张嘴说什么，便又添了一句，“又是你那十几年前的观点：离开了为理想社会的奋斗，谈不上个人理想。”[[11]](#footnote-11)

在李向南的知识结构中，个人是无法离开集体的，个人必须融入历史前进的滔滔洪流中，只有在集体中个人价值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俨然是十七年时期“革命理想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林虹话语中“自由”、“存在”、“完善自我”则明显来自西方个人主义、存在主义。在这里，李向南和林虹选择了重构主体的不同道路。其中一条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再造社会主义新人时期的理论资源，另一条则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主流价值导向的源头。

李向南的改革，究竟成功与否，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当我们反思他的每一项改革举措时，会发现李向南改革的局限性就在于他始终都没有脱离“革命的政治话语”，他的改革至始至终都是在体制内的。[[12]](#footnote-12)

整部小说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故事的结尾似乎也是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但不容忽视的是以理想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主体重构的难度。受到传统势力的阻挠，无法突破体制，而在体制内部又被当作“异人”，得不到认同，最后，当李向南重新审视自我定位时，对康乐说，“我发现我不适合搞政治”，“我想以后当个政治学术家。我可以给中国的改革家们当个高级幕僚，提供各种战略方案供他们选择。那样搞点研究，可能更有意义，更能实现自我。”[[13]](#footnote-13)

虽然李向南在改革中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困境，但由于身份的优越性及超常的理想热情，他尚能被历史所接纳。而在《人生》中，高加林则不得不以身份的转换作为实现价值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进城奋斗的故事。“高加林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也没走过大城门，但平时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又由于山区闭塞的环境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飘洒，眼界也宽阔”[[14]](#footnote-14)，他是一个性格倔强、自尊心很强的青年，不甘于现状，对自己人生有美好憧憬和规划。作为一个出生于土地的人，他决不想一辈子成为土地的奴隶。“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15]](#footnote-15)而摆脱农民身份唯一的方式就是成为“城里人”。身份可以说是烙印在主体上的一个重要符号，对于高加林来说，他的人生价值只有通过身份的转换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高加林的进城之路经历了“去职——务农——进城——返乡”这几个过程。最初作为民办教师的他对于人生还是充满希望的。他想，“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16]](#footnote-16)然而，这个职位却被村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了。灰心丧气的他开始将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17]](#footnote-17)。值得注意的是，身体上的改变并不能带来身份上的超越，高加林试图以肉体的痛苦来宽慰精神上折磨的方法是失败的，他的痛苦通过与巧珍的爱情得到了暂时的缓解，然而，要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却始终埋藏在他心底，蠢蠢欲动。所以，当马占胜为讨好加林叔父通过“走后门”为他找到县委通讯干事的工作时，对此事一向憎恶的他却选择了接受。当上国家干部的高加林热血沸腾、干劲十足，这时的他像李向南一样，“性格中有一种冒险精神——也可以说是英雄主义品格”[[18]](#footnote-18)，通过亲身采访报道南马河公社暴雨救灾情况，他成为全县人眼中的“明星”。“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19]](#footnote-19)像浮士德一样，他的性格中有一种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现代因子，在他满心豪情壮志要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前进时，却因被人检举“走后门”而失去了工作，重新回归土地。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阻止了高加林进城？”从表层文本来看，克男母亲向纪委检举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是导致他被撤销工作和城市户口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可以想见，当高加林成为国家干部并越走越远之后，总会被卷入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之中，政治斗争难以避免。除此之外，其他社会历史条件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工农之间的差异、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距离、社会分工等诸多因素也造成了高加林的悲剧。由此我们看到，现代性一方面带来思想解放，帮助青年们从内在完成主体的形塑，另一方面又带来制度等外部条件的阻隔，制约其投入社会共同体之中。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所说，“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20]](#footnote-20)其次，从作者的写作态度来看，让高加林回到土地并发出忏悔的叫喊带有明显的道德评判的痕迹，高加林们“背离”土地的做法是其无法接受的，“乡土中国”这一巨大传统背景也制约着他们完成主体的重构。

虽然高加林最终回归了土地，但其个人意识已经无法匹配曾经的“农民”身份，想要通过身份转换达到“身心合一”，却忽视了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制约着主体重构这一事实。慢慢脱离历史大框架，从环境中不断剥离出来的个体无处安置，于是成为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幽灵。如果说，李向南、高加林的成长还与当时历史语境有密切联系，那么《你别无选择》中的青年们则更像是处于一座孤岛上，与历史剥离开来。这个故事里的时间是凝滞的，如一潭死水。不过，刘索拉的写作意图也不在于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这个“去历史化”的文本只是记录了一群音乐学院大学生们疯疯癫癫的琐碎日常生活。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已经完全摆脱了历史的宏大叙述，转而走向人的内面情绪的发泄。

故事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类：其一，高度抽象化的个人，没有名字，读者记住的只有他们夸张的性格特征。他们浑浑噩噩，过着没有规则、没有秩序的生活。比如，“‘懵懂’一天到晚只想睡觉。她能很快弄懂老师讲的，又能很快把它们忘掉，她当天听，就得当天做题，还得当天给老师改，否则过了几天，她就会否认这道题是自己做的。你再告诉她对错都是白搭，她早忘了准则。”[[21]](#footnote-21)又比如，“‘猫’是个娇滴滴的女孩，她只要不愿做习题就像猫一样喵喵叫”[[22]](#footnote-22)，仿佛失语一般。相对守规矩一点的是“时间”，“她精确非常，每天早晨六点铃声一响，腾地就从床上坐起来……她认真做所有课程的笔记，连开一次班会也要掏出本来。没有一门功课她不认真。”可是她也并非服从规则的人，“当同时有两个男生追求她时，她全不拒绝。”[[23]](#footnote-23)在这里，身份显得不那么重要，个人已然成为虚化的符号。

其二，对一切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内心焦虑不安、在虚空中寻求存在的意义，比如《你别无选择》的线索人物李鸣。“有才能、有气质、富有乐感”的他一心一意就只想退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总是躺着。“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他觉得自己生了病，症状之一是身体太健康、神经太健全。”[[24]](#footnote-24)作为一个“局外人”，他认清了在贾教授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桎梏下难以实现创新的现实，认为一切的抗争都是无意义。但是，他内心又怀着一丝渴望，终于在听了森森的作品之后被唤醒。对于“小个子”，我们能记住的就是他不断擦拭功能圈的行为。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暗示着打破旧有规则之后，陷入无秩序慌乱中的青年主体焦虑不安的情绪。最后，在“这里什么都找不到”的小个子决定出国寻找，也许是去寻找可以安置自身的新秩序。

其三，追求自我意志，主动踏上自我解放之路，比如寻找“自己的力度”的森森。森森的创新遇到过贾教授所代表的传统势力的阻挠，但更令他痛苦的是：

“……他挖掘了所有现代流派现代作品，但写出来的只是那些流派的翻版。这种探索不断折磨他。有没有一种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音响？他自己的追求在哪儿？他自己的力度在哪儿？……匈牙利人的灵魂是巴托克找到的，但也许匈牙利人更懂得贝多芬。这是最让森森悲哀的事。森森要找自己民族的灵魂，但自己民族的人也会说森森不如贝多芬。贝多芬，贝多芬，他的力度征服了世界，在地球上竖起了一座可怕的大峰，靠着顽固与年岁，罩住了所有后来者的光彩。”[[25]](#footnote-25)

对以上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森森的焦虑还来源于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保全自我的困惑，以及重建的自我能否得到外在认同的担忧。森森意识到了在学习西方现代派技法的同时还面临着丧失自我的危险。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在他真正找到自我之前，这个问题是无从解决的。另外，如果他的作品仅仅以自我感觉为中心而无法获得他人的认同，这种创新也是没有意义的。安东尼·吉登斯在解释“存在性焦虑”这个概念时谈到，“信任的缺场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信任’：或者不信任抽象体系，或者不信任个人。说到抽象体系，不信任意味着对抽象体系所体现的专业知识持怀疑或明显的否定态度。说到对个人的不信任，则意味着怀疑或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体现或展示的诚实性。信任的建立在这里恰恰是认同客体与个人明显特征的条件。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得以建立，或者，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后果便是存在性焦虑。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26]](#footnote-26)由此分析森森焦虑的根源时我们发现，这种存在性焦虑即为不信任，一是对专业知识的不信任，可以理解为对受西方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新的知识结构发生怀疑。二是对他人的不信任，表现在急切地获得他人认同但又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上。实质上，以上两种情况都同时指向了对自己的不信任。显然，森森通过创新做出的主体选择还面临着现代性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

让我们来看看小说结尾一处细节描写：

“他把整个抽屉都抽出来，发现最里面有一盘五年都不曾听过的磁带，封面上写着：《莫扎特朱庇特C大调交响乐》。他下意识地关上了自己的音乐，把这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顿时，一种清新而健全、充满了阳光的音响深深地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混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他欣喜若狂，打开窗户看看清净如玉的天空，伸手去感觉大自然的气流。突然，他哭了。”[[27]](#footnote-27)

值得讨论的是，莫扎特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代表作曲家，崇尚现代派的森森为什么在听到他的音乐后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解脱”？是否森森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这是否透露出一个信息：获得自由意志的个体开始重新思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小说在一片琐碎繁杂之后最终回归平静和庄严。可是，这种传统所带来的庄严的力量真的可以治愈现代性带来的后果吗？

**三、结语：历史的可能性**

从《新星》到《你别无选择》，仅从小说题目我们便可洞察出八十年代对于“潘晓问题”回应态度的演变：从积极参与改革进程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到因改革涉及的重重问题制约个人发展而引发质疑，再到逃离历史语境躲进个人日常生活的“小洞穴”中。如果说我们在《新星》中还能体察到个人对投身新秩序的热情，那么在《你别无选择》中，这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则一点点被消磨殆尽，直至九十年代直接被市场和资本消解。

然而，我们不能将历史的现实性误认作历史的必然性。正如王学典在《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一书中所说，“最初，历史是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历史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最后只有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其他那些可能性则夭折了。由于曾经存在过的那些可能性因素随着后来历史的延伸而消失的无影无踪，后人能看到的只是那种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以致于人们会产生错觉认为当时只存在这一种可能性或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能变为现实性，这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从而低估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8]](#footnote-28)历史发展的猛烈劲头极易掩盖其最初萌芽时的朦胧状态。虽然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引导青年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主流，但是作为其一体双面的理想主义首先担任了时代先锋的角色，并且这种价值倾向以不同变体的形式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实际是‘十七年’社会模型的某种改装和缩编。理想、目标方针和政策的核心价值都没有变，变的是以‘改革开放’为口号对这些东西做了历史性的改装。”[[29]](#footnote-29)在此前提下，李向南实则为八十年代再造“新人”运动中打造出的典型形象，一直未能逃脱出历史的架构。另一方面，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千千万万个“高加林”走上自我解放之路，然而随着环境的改变，个人意识形态的凸显，当“孤立的个人”从历史中走出之时，他们和《你别无选择》中的青年一样，陷入新一轮的自我认同危机之中。这时，独立的个体将重新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避免个体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踏入被历史捆绑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即探索一种能将个人纳入社会共同体之中，同时保持一种和谐性的方式的存在。因此，历史的多样性在此处显示出它的价值：提供多条出路。我们迫切需要看到八十年代的多样性：既是激情洋溢的年代，也是迷惘失落的年代。只有认同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对八十年代的理解才不致落入片面。

**参考文献**

[1]　柯云路．新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3]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4]　彭波．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典．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 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　程光炜 杨庆祥．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9]　郭楠柠．“潘晓”讨论前前后后［J］．当代青年研究，1994，（2）．

[10]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10，（7）．

[11]　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J］．南方文坛，2011，（1）．

[12]　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J］．南方文坛，2005，（5）．

1. 彭波．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11． [↑](#footnote-ref-1)
2. 郭楠柠．“潘晓”讨论前前后后［J］．当代青年研究，1994，（2）：26． [↑](#footnote-ref-2)
3. 彭波．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8． [↑](#footnote-ref-3)
4. 彭波．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8． [↑](#footnote-ref-4)
5. 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J］．南方文坛，2011，（1）：48． [↑](#footnote-ref-5)
6. 杨庆祥．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J］．南方文坛，2011，（1）：48． [↑](#footnote-ref-6)
7. 郭楠柠．“潘晓”讨论前前后后［J］．当代青年研究，1994，（2）：27． [↑](#footnote-ref-7)
8. 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10，（7）：33． [↑](#footnote-ref-8)
9. 柯云路．新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1． [↑](#footnote-ref-9)
10. 柯云路．新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98． [↑](#footnote-ref-10)
11. 柯云路．新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77． [↑](#footnote-ref-11)
12. 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J］．南方文坛，2005，（5）．该文对李向南的体制内改革进行了详细阐释。 [↑](#footnote-ref-12)
13. 柯云路．新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95． [↑](#footnote-ref-13)
14.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25． [↑](#footnote-ref-14)
15.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5． [↑](#footnote-ref-15)
16.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5． [↑](#footnote-ref-16)
17.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52． [↑](#footnote-ref-17)
18.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128． [↑](#footnote-ref-18)
19. 路遥．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143． [↑](#footnote-ref-19)
2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 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 [↑](#footnote-ref-20)
21.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 [↑](#footnote-ref-21)
22.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 [↑](#footnote-ref-22)
23.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15． [↑](#footnote-ref-23)
24.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9． [↑](#footnote-ref-24)
25.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2． [↑](#footnote-ref-25)
2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7． [↑](#footnote-ref-26)
27.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62． [↑](#footnote-ref-27)
28. 王学典．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60. [↑](#footnote-ref-28)
29. 程光炜 杨庆祥．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21． [↑](#footnote-ref-29)